

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的演变：1984—2024

卢晶亮 冯帅章*

摘 要：本文利用多种统计数据分析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城镇失业率、劳动参与率、就业结构以及工资的变动趋势，并基于“三因素（需求、供给、制度）四阶段（孕育期、成型期、发展期、重构期）”的分析框架，通过对文献的系统梳理，总结了不同阶段城镇劳动力市场的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城镇劳动力市场；经济转型与发展；劳动力市场重构

DOI：10.13821/j.cnki.ceq.2025.03.01

一、引 言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劳动力市场发轫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① 伴随着经济的转型与发展，城镇劳动力市场经历了快速的结构变迁。已有文献总结了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至 2013 年前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历程与主要特征（蔡昉，2007；Cai et al., 2008；Meng, 2012；Song, 2017；吴要武，2020）。本文基于多种统计数据，结合对文献的系统梳理，回顾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今城镇劳动力市场的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

本文采用“三因素四阶段”的框架展开分析。具体而言，我们将影响城镇劳动力市场演变的因素归结为“需求-供给-制度”三个方面，根据不同阶段主导因素的不同将城镇劳动力市场的演变划分为“孕育时期”、“成型时期”、“发展时期”与“重构时期”四个阶段。在表 1 中我们总结了每个阶段劳动力市场演变的主要特征，并将结合文献回顾发掘其背后的驱动因素。

表 1 城镇劳动力市场演变的四个阶段

	孕育时期： 1984—1994 年	成型时期： 1995—2002 年	发展时期： 2003—2012 年	重构时期： 2013 年至今
失业率	低位徘徊：≤5%	快速上升：最高达到 10% 左右	缓慢回落：降至 7% 左右	回到低位：结构分化，青年失业率攀升

* 卢晶亮、冯帅章，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通信作者及地址：冯帅章，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601 号暨南大学中惠楼 107 室，510632；电话：020-85221755；E-mail：shuaizhang.feng@foxmail.com。冯帅章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2AZD079)的资助。卢晶亮感谢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24CYJ56)的资助。作者感谢本刊匿名审稿专家的建设性意见，以及卓依、刘洁仪、乔纪出色的助研工作。

① 1993 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改革劳动制度，逐步形成劳动力市场”。

(续表)

		孕育时期: 1984—1994 年	成型时期: 1995—2002 年	发展时期: 2003—2012 年	重构时期: 2013 年至今
劳动力市场关键统计指标	劳动参与率	较高: >80%	加速下降: 降至 75% 左右	总体缓慢下降, 青年劳动参与率快速下降	总体保持平稳, 青年劳动参与率继续下降
	就业结构	农业就业比重 >50% 国有部门就业占据主导地位	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基本不变 国有部门就业比重快速下降: 60% 至 34%	农业(二、三产业)就业比重快速下降(上升) 国有部门就业比重缓慢下降: 31% 至 22% 乡-城流动劳动力就业比重显著上升	农业(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继续下降(上升) 国有部门就业比重保持稳定: 19% 左右 城-城流动劳动力就业比重显著上升
	工资	水平较低, 增速较慢	增速加快, 不平等程度快速上升	保持较快增长, 不平等程度继续扩大	增速显著放缓, 不平等程度高位徘徊

注: (1) 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数据见图 1 和图 2; (2) 三次产业就业结构数据见图 3; (3) 所有制就业结构数据见图 4。

孕育时期(1984—1994 年) 这段时期我国城镇就业仍保持计划经济特色, 劳动力市场还处于萌芽状态; 绝大多数城镇劳动者都在国有部门就业, 工作由政府劳动部门计划安排(吴要武, 2020)。城镇地区的失业率较低(低于 5%), 劳动参与率较高(超过 80%), 工资水平较低且增长缓慢。^① 同时期劳动力市场发育的亮点在于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吸纳了绝大多数农业转移劳动力, 1994 年年末乡镇企业就业规模达到 1.2 亿人。^② 乡镇企业的发展加强了市场竞争, 给国有企业改革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为城镇劳动力市场的成型准备了条件。

成型时期(1995—2002 年) 制度层面的经济结构调整即国有企业改革, 彻底改变了原有的就业体制, 加速了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形成。1998—2002 年, 国有和集体企业累计新增下岗职工 2 474 万人。^③ 民营经济开始快速发展, 并逐步成为吸纳城镇就业的主体。企业能在更大程度上根据市场状况决定雇佣和工资, 劳动者也有了更大的就业自主权, 城镇劳动力市场开始加速成型(Cai et al., 2008)。受国企改革的影响, 这段时期内城镇失业率迅速攀升至 10% 的高点, 劳动参与率开始下降, 工资不平等程度快速上升。

发展时期(2003—2012 年) 需求侧对外贸易的扩张和供给侧劳动力流动的加速共同推动了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快速发展。2001 年,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出口扩张不仅促进了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业转移(Erten and Leight, 2021; Feng et al., 2024), 还促进了乡城劳动力流动(Facchini et al., 2019)。十年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由 49.1% 下降至 33.5%, 城镇就业比重由 35.6% 上升至 48.9%。^④ 城镇非农就业人员中农民工的比重由 2000 年的 33.6% 增加至 2010 年的 46.1%, 基于户籍制度的城镇新二元

① 失业率、劳动参与率和平均工资的数据详见图 1、图 2 和图 5。

②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5)》。

③ 数据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9—2003)。

④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摘要(2023)》。

结构逐步形成。^① 这段时期内城镇失业率开始逐步回落，工资保持较快增长但不平等程度继续扩大。

重构时期(2013 年至今) 2013 年以来，影响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因素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从需求侧看，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外贸依存度下降，劳动力需求减弱；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新的劳动力需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不断扩大。^② 从供给侧看，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劳动参与率下降；另一方面，青年劳动力尤其是高校毕业生的规模逐年增加。劳动力市场存在结构性矛盾：一方面，青年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存在错配，失业率持续上升(Feng et al., 2023)；另一方面，新就业形态虽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但就业质量仍有待提高。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历重构，未来的演变趋势有待观察。

与现有文献比较，本文主要有两点贡献。第一，本文对我国城镇失业率、劳动参与率、就业结构和工资等劳动力市场关键统计指标的长期变动趋势进行了系统梳理，澄清若干特征事实。第二，本文明确提出“三因素四阶段”的分析框架，通过文献回顾从“需求-供给-制度”三个方面总结不同阶段影响劳动力市场演变的主要因素。

二、劳动力市场关键统计指标的变化趋势

(一) 失业率

2018 年起，国家统计局开始每月发布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在这之前的 40 年间，官方只公布城镇登记失业率。但是随着城镇劳动力市场的迅速发育，尤其是国企改革造成大量职工下岗与再就业，城镇登记失业率已经无法反映我国的真实失业状况(张车伟和吴要武，2003；Giles et al., 2005；Feng et al., 2017)。

由于官方调查失业率数据的长期缺失，学者主要利用人口普查和其他微观数据来估算我国不同时期的失业率(张车伟和吴要武，2003；Giles et al., 2005；Knight and Xue, 2006；Liu, 2012；Zhang et al., 2016；Feng et al., 2017)。基于 Zhang et al.(2016)和 Feng et al.(2017)的研究结果、官方发布数据以及自行估算，我们梳理了自 1988 年以来城镇调查失业率的变化趋势。

图 1 显示，1988—1994 年，城镇失业率处在 3%—4% 的低水平。1995—2002 年，城镇失业率开始快速攀升至 10% 的高点，这主要归因于国企改革导致大量职工下岗(Dong and Xu, 2009)。2003—2012 年，城镇失业率缓慢回落至 8% 左右。2013 年以来，城镇失业率继续下降，近年来保持在 5% 左右。但值得注意的是，16—24 岁群体的失业率自 2018 年以来持续上升，最高攀升至 20% 左右(Feng et al., 2023)。

^① 数据见表 2。

^② 数据来自全国总工会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https://www.workercn.cn/papers/grrb/2023/03/01/2/news-1.html>，访问时间：2024 年 11 月 12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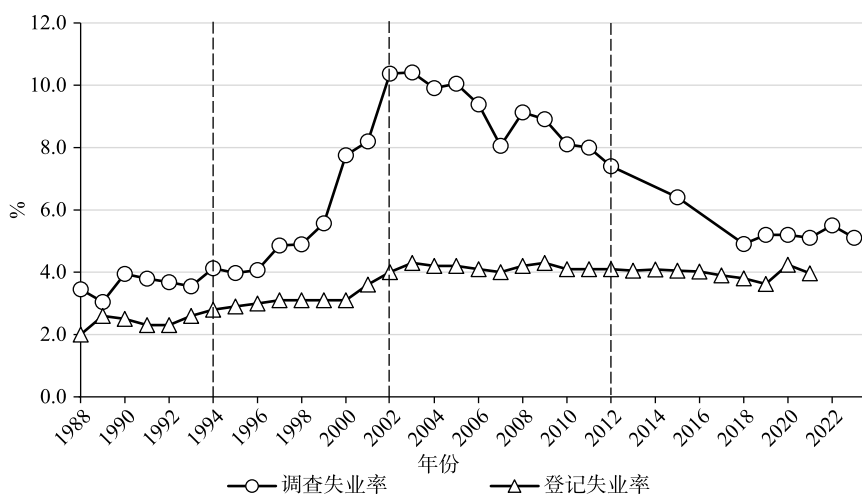


图1 城镇失业率:1988—2023年

注:(1)1988—2009年失业率的估计来自Feng et al.(2017);(2)2010—2012年失业率的估计来自Zhang et al.(2016);(3)2015年的数据由作者基于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估算得到;(4)2018—2023年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每年12月份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1988—2021年城镇登记失业率来自《中国统计摘要(2023)》。^①

(二) 劳动参与率

劳动参与率并非我国常规公布的官方统计指标,现有文献通常利用人口普查和其他微观数据对同时期的劳动参与率进行估算(张车伟和吴要武,2003;蔡昉和王美艳,2004;Liu, 2012; Feng et al., 2017; 吴要武和陈梦玫,2021)。基于Feng et al.(2017)的研究结果以及自行估算,我们同样梳理了1988—2020年间城镇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趋势(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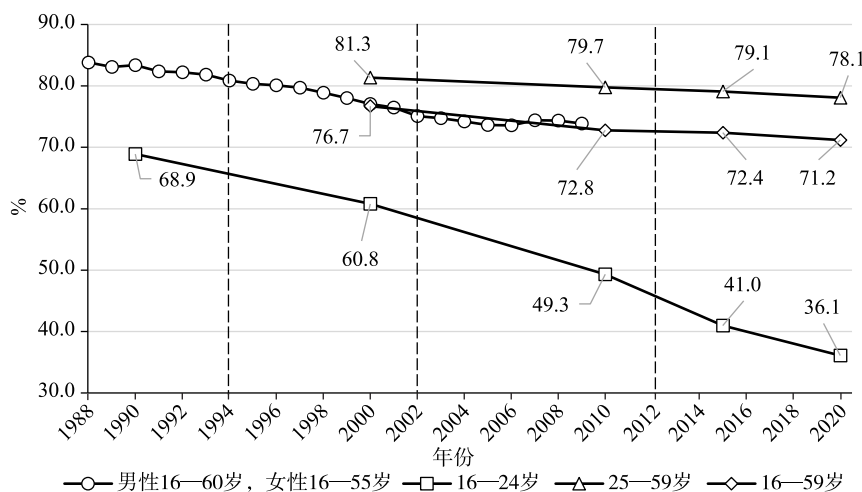


图2 城镇劳动参与率:1988—2020年

注:(1)1988—2009年城镇16—60岁男性,16—55岁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估计来自Feng et al.(2017);(2)1990、2000、2010年的数据由作者基于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得到;(3)2015年的数据由作者基于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估算得到;(4)2020年城镇劳动参与率的估计过程详见附录I。其他估计细节同样参见附录I。

^① 失业率的估计细节详见附录I。篇幅所限,附录未在正文列示,感兴趣的读者可在《经济学》(季刊)官网(<http://ceq.ccer.pku.edu.cn>)下载。

图2显示,总体劳动参与率在1988—1994年间维持在80%之上,在1995—2002年间稳步下降至75%左右。2003—2012年,16—59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由2000年的76.7%降至2010年的72.8%。其中,25—59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保持在较高水平,但16—24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经历了快速下降,由2000年的60.8%降至2010年的49.3%。主要原因是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青年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显著提升,劳动参与率明显下降。2013年以来,总体劳动参与率保持平稳,但16—24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继续快速下降,2020年降至36.1%。

(三) 就业结构

图3展示了过去40年间我国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和城乡就业结构的变化趋势。^① 1984—1994年,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由64%下降至54.3%,年均下降1.2个百分点,二、三产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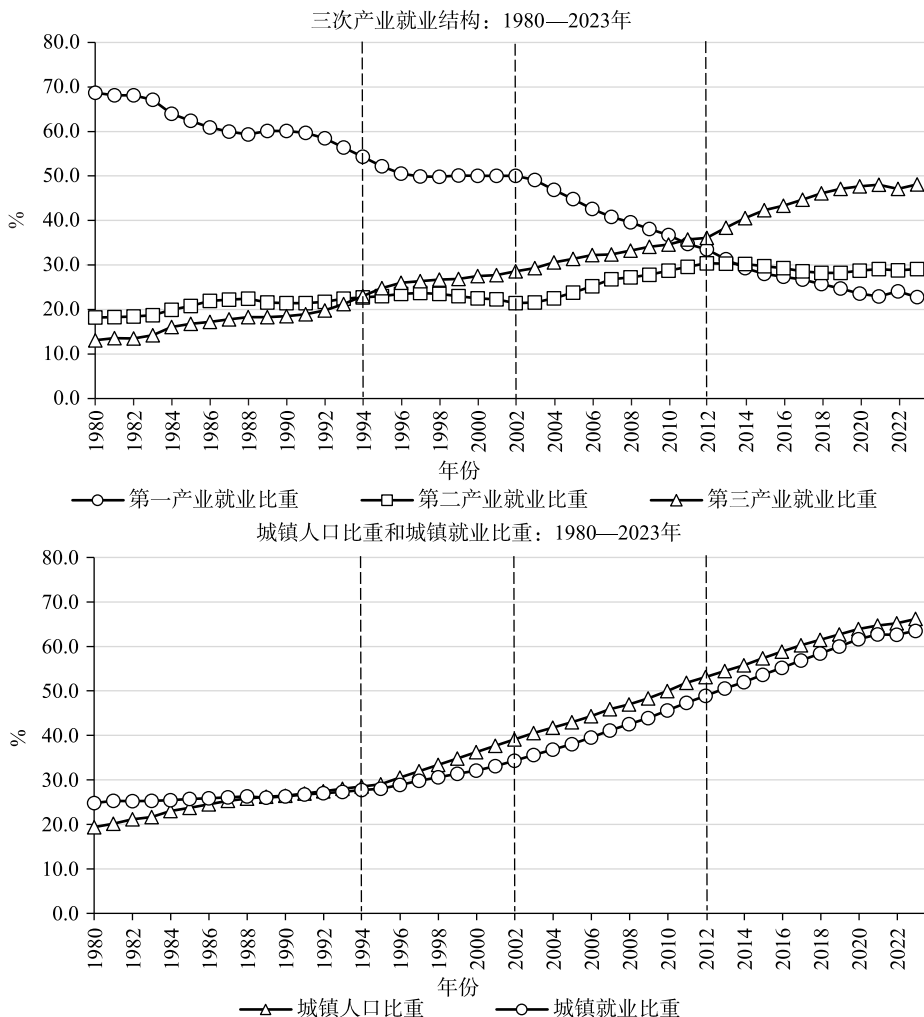


图3 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和城乡就业结构:1980—2023年

注:数据来自《中国统计摘要(2024)》。

^① 基于历次人口普查资料,我们还估算了城镇地区职业就业结构的变化趋势,详见附图A1。

就业比重年均上升0.4和0.8个百分点。1995—2002年,一、二产业就业比重年均下降0.5和0.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年均上升0.7个百分点。2003—2012年,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迅速下降,由49.1%降至33.5%,年均下降1.7个百分点,二、三产业就业比重年均上升0.9和0.8个百分点。2013年以来,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继续下降,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保持稳定,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继续上升。2023年,我国三次产业就业比重分别为22.8%、29.1%和48.1%。由国际比较可知,我国农业就业比重仍然偏高,农业劳动力转移仍有空间(蔡昉,2018)。

1984—1994年,城镇就业比重仅提高2.3个百分点,由25.4%升至27.7%;1995—2002年,城镇就业比重年均提高0.8个百分点,由28%升至34.3%。2003—2012年,随着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城镇就业比重快速上升,年均提高1.5个百分点。2013年以来,城镇就业比重继续保持较快上升趋势,2023年达到63.5%。

伴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城镇非农就业人员中流动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①表2显示,2005—2010年,流动人口的非农就业比重明显上升,由27.9%增加至34.6%,主要源自乡城流动人口的快速增长,其就业比重由21.5%上升至27.2%。2010—2015年,流动人口的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乡城流动人口的就业比重在2015年下降至20.2%,而城城流动人口的就业比重由7.4%增加至19.3%。

表 2 城镇非农就业中不同户籍人口的构成

单位: %

劳动市场的发展阶段	成型时期	发展时期		重构时期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本地城镇户籍人口(1)	60.2	53.6	46.5	41.9
本地农村户籍人口(2)	15.1	18.5	18.9	18.6
城城流动人口(3)	6.2	6.4	7.4	19.3
乡城流动人口(4)	18.5	21.5	27.2	20.2
流动人口(3)+(4)	24.7	27.9	34.6	39.5
农村户籍人口(2)+(4)	33.6	40.1	46.1	38.8

注:作者基于2000、2010年人口普查,2005、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估算,具体细节参见附录I。

城镇就业结构调整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所有制就业结构的变化。图4显示,1995—2002年,受国企改革的影响,非金融类国企就业人数由7 712万大幅降至4 674万,就业比重由40.5%降至18.6%;而私营企业及个体就业人数由3 739万激增至14 174万,就业比重由19.6%增至56.3%。2003—2012年,非金融类国企就业规模和比重继续下降至3 648万和9.8%,私营企业及个体就业人数增长至22 051万。2013年以来,非金融类国企就业人数保持缓慢下降,私营企业及个体就业人数继续增长至29 230万。2022年,我国城镇就业人员在国有部门(机关事业单位和非金融类国企)以及非国有部门就业的比重分别为18.3%和81.7%。

^① 流动人口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市辖区内人户分离除外)的人口。其中,乡城、城城流动人口分别指城镇地区农村户籍和城镇户籍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就业比重的估算细节见附录I。



图4 按所有制类型划分的城镇就业人数：1995—2022年

注：(1)机关事业单位就业人数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6—2010)、《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1—2023)；(2)非金融类国有企业就业人数来自《中国财政年鉴》(1997—2001, 2006, 2012, 2022, 2023)；(3)港澳台商及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23)》；(4)其他非私营单位就业人数=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数-机关事业单位就业人数-非金融类国有企业就业人数-港澳台及外商企业就业人数，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数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23)》；(5)城镇私营单位和个体就业人数=城镇就业人数-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数，城镇就业人数来自《中国统计摘要(2023)》。

(四) 工资

我国官方公布的工资统计指标是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了适应私营部门就业比重逐步增加的情况，2009年起国家统计局开始发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但一直以来，我国缺少针对全体城镇就业人员具有代表性的平均工资统计指标。借助卢晶亮和冯帅章(2015)的研究结果以及基于《中国住户调查年鉴》数据的自行估算，我们构造了城镇受雇劳动者的平均工资序列，并与城镇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私营单位平均工资、外出农民工平均收入进行比较。

图5显示，城镇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在1988—1994年间增长缓慢(年均4.2%)，年均增速在1995—2002年间达到9.9%，2003—2012年间进一步升至11.2%，但从2009年起增速开始放缓。2003—2009年，根据住户调查数据估算的平均工资年均增长10.5%，表明这段时期城镇受雇劳动者的平均工资整体增长较快。2009—2012年，城镇私营单位平均工资和外出农民工年平均收入的增速均高于城镇非私营单位，部门间的工资差距呈缩小趋势。

2013年以来，城镇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年均增长7%，高于同期经济增速。基于住户调查数据估算的平均工资年均增长5%，这表明城镇受雇劳动者的整体工资增速明显放缓，主要因为私营部门的平均工资增速要低于非私营部门，部门间的工资差距在逐步扩大。2023年，城镇私营单位平均工资和外出农民工年平均收入分别相当于城镇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的57%和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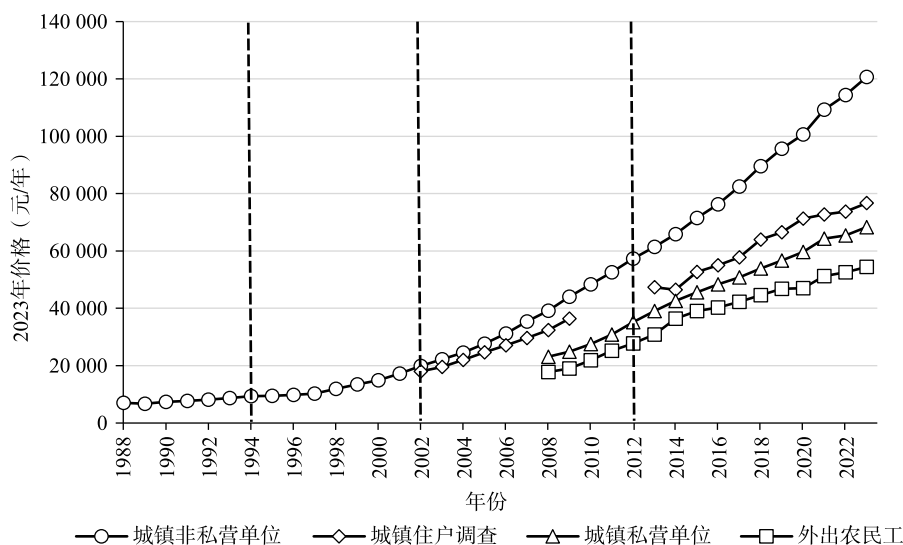


图 5 城镇年平均工资:1988—2023 年

注:(1)城镇非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来自《中国统计摘要(2024)》;(2)基于城镇住户调查估计的年平均工资,2002—2009 年的数据来自卢晶亮和冯帅章(2015)的估算,2013—2023 年的数据由作者基于《中国住户调查年鉴》(2014—2024)估算得到;(3)城镇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来自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http://data.stats.gov.cn/>; (4)外出农民工年平均工资收入基于历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相关数据估计得到;(5)工资水平利用城市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调整为 2023 年价格,城市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来自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http://data.stats.gov.cn/>。各类平均工资的估算细节详见附录 I。

我国没有关于工资不平等的官方统计数据,已有文献主要利用微观数据估计城镇工资不平等的变动趋势。^①表 3 显示,1988—2018 年,城镇工资不平等程度不断扩大,尤其是在 1995—2002 年间大幅上升。根据李实等(2023)的估计,工资 90 分位数与 10 分位数之比由 1988 年的 2.83 上升至 1995 年的 3.85,之后大幅攀升至 2002 年的 5.19,2013 年增加至 6.52,2018 年继续上升至 7.17。

表 3 城镇工资不平等

劳动力市场的发展阶段		对数工资的方差		工资 90 分位数与 10 分位数之比	
		Meng et al.(2013)	李实等(2023)	Meng et al.(2013)	李实等(2023)
		20—60 岁,男性	20—60 岁,全体	20—60 岁,男性	20—60 岁,全体
孕育时期	1988 年	0.279	0.261	2.877	2.826
	1995 年	0.373	0.355	3.745	3.846
成型时期	2002 年	0.522	0.579	4.844	5.191
	2007 年	0.501	0.533	5.451	6.253
发展时期	2013 年		0.751		6.521
	2018 年		0.805		7.171

注:(1)Meng et al.(2013)的估计基于 16 个省份的城镇住户调查(UHS)数据,样本限定为 20—60 岁城镇户籍男性受雇劳动者。(2)李实等(2023)的估计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样本限定为 20—60 岁城镇户籍受雇劳动者。

^①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微观数据是城镇住户调查(UHS)(Meng et al., 2013; Ge and Yang, 2014)和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卢晶亮,2018;李实等,2023)。

三、城镇劳动力市场演变的影响因素

（一）孕育时期（1984—1994年）

1984—1994年，我国城镇就业比重不足30%（图3），而绝大多数的城镇就业都集中在国有部门。1984年，97%的城镇就业人员在国有和集体单位工作，这一比例到1994年国企改革开始时仍高达76%。^①城镇劳动力的就业由政府劳动部门计划安排，工资由政府设置的工资制度决定，各种社会福利均由企业提供（Cai et al., 2008；吴要武，2020）。这段时期虽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在国有企业中引入劳动合同制度以及放松工资管制，但国有企业在解雇工人（Naughton, 2018）和工资决定（Bian, 1994）方面的自主权依然非常有限，就业体制改革的进展相对缓慢。

图3显示，1984—1994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年均下降1.2个百分点，由64%下降至54.3%，而二、三产业就业比重远高于城镇就业比重，这表明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业的转移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农村地区能够创造大量非农就业岗位的主要原因是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乡镇企业就业人数由1984年的5208万人迅速增长至1994年的12017万人，占到农村就业人数的四分之一。^②

由于各地政府诸多限制性政策的存在（Meng, 2012），这段时期农村劳动力还未开始大规模向城镇地区流动。1989年外出农民工的规模约为3000万人，到1993年增加至6200多万人^③，远低于乡镇企业的就业规模。换言之，乡镇企业的发展在没有大规模人口流动的情况下促进了就业结构的调整。更为重要的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加强了市场竞争，暴露了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给国有企业改革带来了更大的压力（Cai et al., 2008）。

到20世纪90年代初，国有企业的亏损情况日渐加剧（Lardy, 1998），存在大量冗员（Dong and Putterman, 2003），政府于1994年开始启动以大型国有企业重点扶持、中小型企业民营企业改制（“抓大放小”）为主要思路的改革（Hsieh and Song, 2015），而国有企业改革正是城镇劳动力市场由萌芽走向成型的起点。

（二）成型时期（1995—2002年）

世纪之交制度层面最重要的经济结构调整，即国有企业改革，加速了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国有企业的“就业破坏”与非国有企业的“就业创造”促使劳动力在短时期内由国有部门转向私营部门就业，这段时期城镇地区非金融类国企的就业比重由40.5%骤降至18.6%（图4）。与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相比，得益于民营部门的快速发展，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创造”效应更大，灵活性更高；企业的就业规模调整主要由市场力量所驱动，表明按市场化方式运行的劳动力市场在逐步形成（Dong and Xu, 2009）。

国企改革带来短期内大量工人下岗，导致城镇失业率快速上升。Feng et al. (2017)

① 城镇就业人数来自《中国统计摘要(2024)》，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就业人数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24)》。

②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5)》。

③ 数据来自《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

基于 UHS 数据的估计表明,城镇失业率由 1995 年的 4% 上升至 2002 年的 10.4%, 基于其他微观数据的估计结果也佐证了这一趋势(Liu, 2012; Giles et al., 2005)。下岗经历让工人遭受了持续性的收入损失并可能因此陷入贫困, 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集中于私营部门和低技能岗位, 并且缺乏合同保护, 工资水平相较于下岗前显著降低(Tian et al., 2022)。

从需求侧来看, 民营经济逐渐成为吸纳城镇就业的主要渠道, 其就业比重由 1995 年的 19.6% 迅速增长到 2002 年的 56.3% (图 4)。从供给侧来看, 乡城劳动力流动开始加速。外出农民工规模由 1996 年的 7 200 万人增长至 2002 年的 10 470 万人。^① 2000 年城镇非农就业人员中乡城流动人口的比重达到 18.5% (表 2)。但由于国企下岗职工再就业带来的压力, 各地政府从政策上限制了农民工的大规模流入(吴要武, 2020)。此外, 由于微观数据的缺乏, 这一时期有关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研究相对较少(Meng and Zhang, 2001)。

这一时期另一个重要的制度变化是始于 1999 年的高校扩招, 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开始持续增加。基于 2000 年和 2005 年人口普查(小普查)的微观数据, 吴要武和赵泉(2010)研究发现高校扩招导致新近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上升, 劳动参与率下降。此外, 高校扩招降低了新近大学毕业生的高等教育溢价, 但提高了年长大学毕业生的高等教育溢价(马光荣等, 2017; Li et al., 2017)。

1995—2002 年, 城镇工资不平等程度迅速扩大, 主要源于技能工资差距、所有制间及行业间工资差距的扩大(卢晶亮, 2018)。基于“所有制”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逐步形成。1995—2002 年, 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间的工资差距有所扩大, 其中由分割效应(即不同所有制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差异)所解释的比例也有所上升, 表明有别于民营部门市场化的工资决定机制, 国有部门就业人员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工资溢价(Démurger et al., 2006)。

(三) 发展时期(2003—2012 年)

从需求侧来看, 2003 年起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 带来劳动力需求的增加, 城镇失业率从高点开始逐步回落(图 1)。尤其是在 2001 年我国加入 WTO 后, 外需的迅速增长创造了大量非农就业岗位, 促进了就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力流动。近期一系列文献以我国加入 WTO 作为政策冲击, 考察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Facchini et al., 2019; Erten and Leight, 2021; Han et al., 2022)以及出口扩张(张川川, 2015; Feng et al., 2024; Ouyang and Yuan, 2024)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基于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张川川, 2015; Han et al., 2022; Feng et al., 2024; Ouyang and Yuan, 2024)和县域数据(Erten and Leight, 2021)的实证研究均表明,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越多或出口扩张幅度越大的地区, 农业就业(比重)下降越多, 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比重)增加越多。对于本地农村户籍人口和跨市流动人口, 地级市层面的出口扩

^① 1996 年外出农民工规模根据《中国第一次农业普查资料综合提要》相关数据估算, 2002 年外出农民工规模根据《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03)》相关数据估算。

张增加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比例,降低了农业就业比例;但对于本地城镇户籍人口,出口扩张降低了服务业就业比例,增加了未就业比例(Feng et al., 2024)。贸易自由化还促进了劳动力流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越多的城市,外来人口占比上升越多(Facchini et al., 2019)。^①

从供给侧来看,2003—2012年乡城劳动力流动持续加速,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年均下降1.7个百分点,城镇就业比重年均增加1.5个百分点(图3)。2005—2010年,城镇非农就业中乡城流动人口和本地农民工的比重分别由21.5%和18.5%上升至27.2%和18.9%(表2)。一系列文献聚焦于户籍制度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Meng, 2012; Song, 2014, 2016; Zhu, 2016; Gregory and Meng, 2018),与人力资本水平相同的城镇劳动力相比,农民工通常失业率更低、工资更低、工作时间更长、更可能从事蓝领职业以及更难进入国有部门就业。

这段时期制度层面的重要变化之一是户籍制度改革,政府在2001年提出要取消小城镇落户限制,2011年提出小城镇放开、中小城市有条件放宽、大城市合理控制落户限制。^②然而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中,流动人口和本地户籍人口在享受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户籍制度减少了流动的预期收益,提高了流动的成本,从而阻碍了劳动力流动并造成效率损失(Song, 2014)。Tombe and Zhu(2019)研究发现,2000—2005年流动成本的下降可以解释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10%。

此外,制度层面上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还在延续。国企改革的“就业破坏”效应在2002年以后有所减弱,贸易自由化同时促进了出口企业 and 非出口企业的就业净增长,部分缓解了国企改革对就业的负面影响(Ma et al., 2015)。不同所有制部门间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对于高收入群体,分割效应依然明显(Démurger et al., 2012)。相较于民企员工,国企员工通常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更难以被解雇,流动性更低,消除两类企业在这些方面的差异将显著降低城镇失业率和长期失业率(Feng and Guo, 2021)。

2003年起,我国开始加强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建设。例如,2004年最低工资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2008年《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开始实施。目前已有一些文献涉及最低工资调整(马双等, 2012; Jia, 2014; Fang and Lin, 2015; Lin and Yun, 2016; 马双等, 2017)和劳动合同法实施(刘媛媛和刘斌, 2014; 杜鹏程等, 2018; Akee et al., 2019)的政策评估,但相对零散且结论不一,仍有待进一步研究,这里不再展开讨论。

这段时期城镇工资不平等程度仍在扩大。2002—2013年,国有企业就业比重下降、非正规就业比重上升、技能工资差距和性别工资差距的扩大是工资不平等上升的主要推动因素(卢晶亮, 2018)。高校扩招显著增加了高技能劳动力供给^③,但并未导致技能溢价

① 另一些研究发现贸易开放扩大了城镇劳动者的性别工资差距,尤其是制造业低技能劳动者的性别工资差距(刘斌和李磊, 2012; 卢晶亮和冯帅章, 2015);而进口竞争(进口关税下降)扩大了劳动参与率的性别差距(Yu et al., 2021)。

② 参见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01]6号),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国办发[2011]9号)。

③ 根据人口普查资料推算,城镇地区15岁及以上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重由2000年的10.8%增加至2020年的26%,详见附图A2。

的下降。因为这段时期贸易开放(Han et al., 2012)、资本积累(卢晶亮, 2017)和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Ge and Yang, 2014)均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推动技能工资差距扩大。

(四) 重构时期(2013 年至今)

2013 年以来,影响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因素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城镇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历重构。从需求侧来看,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外贸依存度下降,导致劳动力需求减弱。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大量新的劳动力需求,并正在改变当前的就业形态,由平台经济驱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规模在不断扩大。

万倩和冯帅章(2023)研究发现,平台就业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补偿性工资提升了从业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基于对平台就业人员的问卷调查数据,董志强等(2023)研究发现平台就业中的性别收入差距要小于传统就业,不可观察因素对收入差距的贡献更小,职业隔离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有限。而 Chen(2024)基于医生在线问诊数据,研究发现女医生的问诊量和收费都低于同等资质的男医生,表明可能存在统计性歧视。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需求侧变化是技术进步。自动化技术包括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对劳动力的影响可能存在替代效应(减少劳动力需求)、生产率效应和就业创造效应(增加劳动力需求)(Acemoglu and Restrepo, 2019, 2020)。实证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的应用会降低制造业企业的雇佣规模(王永钦和董雯, 2020)和制造业部门的工资(王永钦和董雯, 2023),扩大执行非常规任务(non-routine tasks)与常规任务工人间的工资差距(余玲铮等, 2021)。工业机器人的应用还减少了地级市层面外来劳动力的流入(陈媛媛等, 2022)。

从供给侧来看,2013—2023 年,我国 15—64 岁人口比重由 73.9%下降至 68.3%,老年抚养比由 13.1%上升至 22.5%^①,人口老龄化在当下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持续加深将显著改变劳动力供给的规模与结构。童玉芬(2014)基于联合国人口预测数据推测,2030 年后劳动力人口规模将开始快速下降,老年人口比例持续增加将导致我国劳动参与率进一步下降。周祝平和刘海斌(2016)的实证研究验证了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参与率之间的负向关系。

都阳和封永刚(2021)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当老龄化速度达到一定阈值后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Bai and Lei(2020)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速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老龄化导致劳动供给减少从而降低经济增速。Maestas et al.(2023)对美国的研究发现,60 岁以上人口比例每增加 10%,州人均 GDP 会下降 5.5%,其中三分之一是由于就业增长放缓,三分之二是由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

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推进。2014 年政府提出要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

^①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摘要(2024)》。

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①相较于特大城市,大城市的落户限制放宽加剧了新进流动人口和原有流动人口之间的竞争,降低了流动人口的工资水平(An et al., 2024)。张吉鹏和卢冲(2019)利用各级政府历年出台的落户政策文件构建了城市层面的落户门槛指数,张吉鹏等(2020)在此基础上研究发现城市落户门槛差异是导致劳动力回流的重要因素,回流人口多从经济发达地区回到欠发达的户籍所在地的城镇地区。

近期一些研究发现,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在劳动力市场表现方面存在趋同现象(孙婧芳,2017;卢晶亮等,2021)。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在就业概率、职位隔离、小时工资方面的差距都有所缩小,其中户籍歧视的效应也在减弱。但农民工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明显劣势导致他们与本地居民的工资差距依然明显,在进入国有部门就业方面仍存在明显障碍。

四、研究展望

基于“三因素四阶段”的分析框架,本文系统总结了过去40年间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在孕育时期(1984—1994年)、成型时期(1995—2002年)、发展时期(2003—2012年)和重构时期(2013年至今)等不同阶段的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2013年至今,影响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供给-制度”因素发生了显著变化,当下的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历重构,诸多新问题有待研究与解答。

(1) 青年人就业问题。近年来,16—24岁群体的失业率持续攀升(Feng et al., 2023),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图2);预计未来若干年内高校毕业生的数量还将持续增加,而大学教育的回报率已经出现下降的迹象(Hanushek et al., 2023)。理解上述现象需要深入研究影响青年人劳动力市场表现的“需求-供给-制度”因素。

(2) 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人口老龄化是否会拖累经济增长?是否会加速机器人对劳动力的替代?这些问题仍有待解答。此外,人口转型将对退休、养老、社保、生育、教育、户籍等一系列政策带来冲击,如何评估这些政策变化对诸如人口质量、劳动供给、家庭分工、人口流动的影响,也是未来的重点研究方向。

(3) 新就业形态的相关研究。以零工经济(gig economy)为代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规模不断扩大。新就业形态将如何影响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收入分配?就业统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税收体系将如何做出相应的调整?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董志强,2022;冯帅章和万倩,2024)。

(4) 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基于任务模型(task model)的研究框架可以很好地解释自动化技术应用对相关劳动力的替代效应(Restrepo, 2024),但关于更广泛意义上的人工智能技术(例如,生成式AI)将如何影响劳动力市场,相关研究还处于探

^① 参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14〕25号)。

索阶段(Acemoglu et al., 2022; Bloom et al., 2024)。^①

(5) 劳动力市场相关制度的研究。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出于缓解老龄化压力和促进消费等目的,落户限制有望加速放宽。社会福利体系与户籍制度密切相关,相关改革也将随之而来(蔡昉,2023)。城镇劳动力市场逐步由二元结构走向一元结构的经济后果是什么?对人力资本投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城乡融合、劳动生产率以及消费与储蓄有何影响?以上问题都有待更多研究予以解答。

参 考 文 献

- [1] Acemoglu, D., and P. Restrepo, “Automation and New Tasks: How Technology Displaces and Reinstates Labo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9, 33(2), 3-30.
- [2] Acemoglu, D., and P. Restrepo, “Robots and Jobs: Evidence from US Labor Marke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20, 128(6), 2188-2244.
- [3] Acemoglu, D., D. Autor, J. Hazell, and P. Restrep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Jobs: Evidence from Online Vacancie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22, 40(S1), S293-S340.
- [4] Akee, R., L. Zhao, and Z. Zhao,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China’s New Labor Contract Law on Unemployment and Welfare Loss of the Workers”,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9, 53, 87-105.
- [5] An, L., Y. Qin, J. Wu, and W. You, “Th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 of Relaxing Internal Migration Restrictions: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24, 42(1), 161-200.
- [6] Bai, C., and X. Lei, “New Trends in Population Aging and Challenges for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ina Economic Journal*, 2020, 13(1), 3-23.
- [7] Bian, Y., *Work and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 [8] Bloom, D. E., K. Prettnner, J. Saadaoui, and M. Veruet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Skill Premium”, NBER Working Paper, No. 32430, 2024.
- [9] Cai, F., A. Park, and Y. Zhao, “The Chinese Labor Market in the Reform Era”, In: Brandt, L. and T. Rawski (eds.),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67-214.
- [10] 蔡昉,“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第4—14+22页。
- [11] 蔡昉,“农业劳动力转移潜力耗尽了吗?”,《中国农村经济》,2018年第9期,第2—13页。
- [12] 蔡昉,“户籍制度改革的效应、方向和路径”,《经济研究》,2023年第10期,第4—14页。
- [13] 蔡昉、王美艳,“中国城镇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及其政策含义”,《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68—79+207页。
- [14] Chen, Y., “Does the Gig Economy Discriminate Against Women? Evidence from Physicians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24, 103275.
- [15] 陈媛媛、张竞、周亚虹,“工业机器人与劳动力的空间配置”,《经济研究》,2022年第1期,第172—188页。
- [16] Démurger, S., M. Fournier, S. Li, and Z. Wei,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with Rising Segmentation in China’s Urban Labor Market”, *Asian Economic Papers*, 2006, 5(3), 58-101.
- [17] Démurger, S., S. Li, and J. Yang, “Earnings Differentials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in China: Exploring Changes for Urban Local Residents in the 2000s”,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2, 23(1), 138-153.
- [18] Dong, X. Y., and L. C. Xu, “Labor Restructuring in China: Toward a Functioning Labor Market”,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9, 37(2), 287-305.

① 国内相关研究参见郭凯明(2019)、Zhou et al.(2020)、王林辉等(2022)。

- [19] Dong, X. Y., and L. Putterman, "Soft Budget Constraints, Social Burdens, and Labor Redundancy in China's State Industr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3, 31(1), 110-133.
- [20] 董志强, "平台灵工经济: 性质与挑战", 《求索》, 2022年第4期, 第117—125页。
- [21] 董志强、彭娟、刘善仕, "平台灵工经济中的性别收入差距研究", 《经济研究》, 2023年第10期, 第15—33页。
- [22] 都阳、封永刚, "人口快速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 《经济研究》, 2021年第2期, 第71—88页。
- [23] 杜鹏程、徐舒、吴明琴, "劳动保护与农民工福利改善——基于新《劳动合同法》的视角", 《经济研究》, 2018年第3期, 第64—78页。
- [24] Erten, B., and J. Leight, "Exporting Out of Agriculture: The Impact of WTO Accession o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21, 103(2), 364-380.
- [25] Facchini, G., M. Y. Liu, A. M. Mayda, and M. Zhou, "China's 'Great Migration': The Impact of the Reduction in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9, 120, 126-144.
- [26] Fang, T., and C. Lin, "Minimum Wages and Employment in China", *IZA Journal of Labor Policy*, 2015, 4, 1-30.
- [27] Feng, S., and N. Guo, "Labor Market Dynamics in Urban China and the Role of the State Sector",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21, 49(4), 918-932.
- [28] Feng, S., Y. Hu, and R. Moffitt, "Long Run Trends in Unemployment and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7, 45(2), 304-324.
- [29] Feng, S., J. Lu, A. Terada-Hagiwara, and W. Qi, "A Closer Look at Causes of Youth Unemploy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DB Briefs, No. 247, 2023.
- [30] Feng, S., J. Lu, and L. Shen, "Hukou Matters: The Heterogeneous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Export Expansions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24, 52(1), 321-340.
- [31] 冯帅章、万倩, "平台就业的分类与特征: 来自互联网招聘大数据的证据", 《劳动经济研究》, 2024年第5期, 第13—34页。
- [32] Ge, S., and D. T. Yang, "Changes in China's Wage Structur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14, 12(2), 300-336.
- [33] Giles, J., A. Park, and J. Zhang, "What Is China's True Unemployment Rate?",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5, 16(2), 149-170.
- [34] Gregory, B., and X. Meng, "Rural-to-Urban Migration and Migrants' Labour Market Performance, 2008-16", In: Garnaut, R., L. Song, and F. Cai (eds.), *China'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1978-2018*, ANU Pres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2018, 395-427.
- [35] 郭凯明, "人工智能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管理世界》, 2019年第7期, 第60—77+202—203页。
- [36] Han, J., R. Liu, and G. Wu,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Chinese Local Labor Markets", Working Paper, 2022.
- [37] Han, J., R. Liu, and J. Zhang, "Globalization and Wage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Urban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2, 87(2), 288-297.
- [38] Hanushek, E. A., Y. Wang, and L. Zhang, "Understanding Trends in Chinese Skill Premiums, 2007-2018", NBER Working Paper, No. w31367, 2023.
- [39] Hsieh, C. T., and Z. M. Song, "Grasp the Large, Let Go of the Small: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ate Sector in China",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015, Spring, 295-346.
- [40] Jia, P., "Employment and Working Hour Effects of Minimum Wage Increase: Evidence from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2014, 22(2), 61-80.
- [41] Knight, J., and J. Xue, "How High Is Urban Unemployment in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2006, 4(2), 91-107.

- [42] Lardy, N. R., *China's Unfinished Economic Revoluti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8.
- [43] Li, H., Y. Ma, L. Meng, X. Qiao, and X. Shi, "Skill Complementarities and Returns to Higher Education: Evidence from College Enrollment Expansion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7, 46, 10-26.
- [44] 李实、吴珊珊、邢春冰, "中国城镇劳动力工资收入差距的长期演变", 《财经问题研究》, 2023 年第 7 期, 第 16—30 页。
- [45] Lin, C., and M. S. Yun, "The Effects of the Minimum Wage on Earnings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China", In: Cappellari, L, S. W. Polachek, and K. Tatsiramos(eds.), *Income Inequality Around the World (Research in Labor Economics, Vol. 44)*.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2016, 179-212.
- [46] 刘斌、李磊, "贸易开放与性别工资差距", 《经济学》(季刊), 2012 年第 2 期, 第 429—460 页。
- [47] Liu, Q., "Unemployment and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Urba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2, 23(1), 18-33.
- [48] 刘媛媛、刘斌, "劳动保护、成本粘性与企业应对", 《经济研究》, 2014 年第 5 期, 第 63—76 页。
- [49] 卢晶亮, "资本积累与技能工资差距——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经济学》(季刊), 2017 年第 2 期, 第 577—598 页。
- [50] 卢晶亮, "城镇劳动者工资不平等的演化:1995—2013", 《经济学》(季刊), 2018 年第 4 期, 第 1305—1328 页。
- [51] 卢晶亮、陈技伟、冯帅章, "人的城镇化:农民工的城市劳动力市场融入", 《劳动经济研究》, 2021 年第 4 期, 第 29—56 页。
- [52] 卢晶亮、冯帅章, "贸易开放、劳动力流动与城镇劳动者性别工资差距——来自 1992—2009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财经研究》, 2015 年第 12 期, 第 15—25 页。
- [53] 马光荣、纪洋、徐建伟, "大学扩招如何影响高等教育溢价?", 《管理世界》, 2017 年第 8 期, 第 52—63 页。
- [54] Ma, H., X. Qiao, and Y. Xu, "Job Creation and Job Destruction in China During 1998-2007",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5, 43(4), 1085-1100.
- [55] 马双、李雪莲、蔡栋梁, "最低工资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 《经济研究》, 2017 年第 6 期, 第 153—168 页。
- [56] 马双、张劼、朱喜, "最低工资对中国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 《经济研究》, 2012 年第 5 期, 第 132—146 页。
- [57] Maestas, N., K. J. Mullen, and D. Powell, "The Effect of Population Aging on Economic Growth, the Labor Force, and Productivity",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023, 15(2), 306-332.
- [58] Meng, X., "Labor Market Outcomes and Reforms in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2, 26(4), 75-102.
- [59] Meng, X., and J. Zhang, "The Two-Tier Labor Market in Urban China: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and Wage Differentials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in Shanghai",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1, 29(3), 485-504.
- [60] Meng, X., K. Shen, and S. Xue, "Economic Reform, Education Expansion, and Earnings Inequality for Urban Males in China, 1988-2009",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3, 41(1), 227-244.
- [61] Naughton, B. J., *The Chinese Economy: Adaptation and Growth*. MIT Press, 2018.
- [62] Ouyang, D., and W. Yuan, "The Flip Side of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in Chin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24, 32(5), 2051-2094.
- [63] Restrepo, P., "Automation: Theory, Evidence, and Outlook",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2024, 16, 1-25.
- [64] Song, Y., "What Should Economists Know About the Current Chinese Hukou System?",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4, 29, 200-212.
- [65] Song, Y., "Hukou-Based Labour Market Discrimination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in Urban China", *Urban Studies*, 2016, 53(8), 1657-1673.
- [66] Song, Y., "Six Central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Labour Market: A Literature Survey",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2017, 156(2), 213-242.
- [67] 孙婧芳, "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户籍歧视的变化:农民工的就业与工资", 《经济研究》, 2017 年第 8 期, 第 171—

- 186 页。
- [68] Tian, X., J. Gong, and Z. Zhai, "The Effect of Job Displacement on Labor Market Outcomes: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2, 72, 101743.
- [69] Tombe, T., and X. Zhu, "Trade, Migration, and Productivity: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9, 109(5), 1843-72.
- [70] 童玉芬, "人口老龄化过程中我国劳动力供给变化特点及面临的挑战", 《人口研究》, 2014 年第 2 期, 第 52—60 页。
- [71] 万倩、冯帅章, "平台就业的收入效应研究", 《中国人口科学》, 2023 年第 6 期, 第 80—94 页。
- [72] 王林辉、胡晟明、董直庆, "人工智能技术、任务属性与职业可替代风险:来自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管理世界》, 2022 年第 7 期, 第 60—79 页。
- [73] 王永钦、董雯, "机器人的兴起如何影响中国劳动力市场? ——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经济研究》, 2020 年第 10 期, 第 159—175 页。
- [74] 王永钦、董雯, "人机之间:机器人兴起对中国劳动者收入的影响", 《世界经济》, 2023 年第 7 期, 第 88—115 页。
- [75] 吴要武, "70 年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20 年第 4 期, 第 30—48 页。
- [76] 吴要武、陈梦孜, "中国劳动参与率变化:继续下降还是已经反弹", 《劳动经济研究》, 2021 年第 4 期, 第 117—140 页。
- [77] 吴要武、赵泉, "高校扩招与大学毕业生就业", 《经济研究》, 2010 年第 9 期, 第 93—108 页。
- [78] 余玲铮、魏下海、孙中伟、吴春秀, "工业机器人、工作任务与非常规能力溢价——来自制造业‘企业—工人’匹配调查的证据", 《管理世界》, 2021 年第 1 期, 第 47—59+4 页。
- [79] Yu, Z., X. Wu, M. Li, and R. Guo, "Import Competition and the Gender Gap in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1, 69, 101689.
- [80] Zhang, J., L. Xu, and H. Zhang, "Uncovering the Truth About Chinese Urban Unemployment Rates: 2005-2012", *China & World Economy*, 2016, 24(6), 1-18.
- [81] 张伟伟、吴要武, "城镇就业、失业和劳动参与:现状、问题和对策", 《中国人口科学》, 2003 年第 6 期, 第 37—44 页。
- [82] 张川川, "出口对就业、工资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基于微观数据的证据", 《经济学》(季刊), 2015 年第 4 期, 第 1611—1630 页。
- [83] 张吉鹏、黄金、王军辉等, "城市落户门槛与劳动力回流", 《经济研究》, 2020 年第 7 期, 第 175—190 页。
- [84] 张吉鹏、卢冲, "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落户门槛的量化分析", 《经济学》(季刊), 2019 年第 4 期, 第 1509—1530 页。
- [85] Zhou, G., G. Chu, L. Li, and L. Meng, "The Effe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China's Labor Market", *China Economic Journal*, 2020, 13(1), 24-41.
- [86] 周祝平、刘海斌,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 《人口研究》, 2016 年第 3 期, 第 58—70 页。
- [87] Zhu, R., "Wage Differentials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in Urban China During 2002-2007: A Distributional Analysis",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6, 37, 2-14.

Evolution of China's Urban Labor Market: 1984—2024

LU Jingliang FENG Shuaizhang*

(Jinan University)

Abstract: We use various statistical data to analyze the trends in the urban unemployment rat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employment structure, and wages since the mid-1980s. Based on the “three-factors (demand, supply and institution) & four-stages (incubation,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reconstitution)” framework and through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we summarize the pattern of labor market evolution and the economic factors shaping the labor market at different stages. Finally, we provide an outlook on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Keywords: urban labor marke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labor market restructuring

JEL Classification: J21, J31, J61

* Corresponding Author: FENG Shuaizhang,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Jinan University, Tianhe District,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China; Tel: 86-20-85221755; E-mail: shuaizhang.feng@foxmail.com.